

杨万里 著

真

暄

集

杨万里 著

真

暄

集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负暄集/杨万里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1118-661-1

I. ①负… II. ①杨…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
究-中国-宋代~清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3880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徐丽华

封面设计 施羲雯

封面题签 曹隽平

技术编辑 金 鑫

负 暄 集

杨万里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x124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0000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8-661-1/I·113 定价: 42.00 元

序 一

蒋哲伦

翻开杨万里送来的《负暄集》打印稿，不禁回想起十六年前他负笈来沪研读硕士生的情景：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带着湘人特有的自信和崛劲，那股“有志于学”、“义无反顾”的气概，似乎广阔的前景就展现在他眼前。

入学后，他果然勤奋，每日清晨，漱洗完毕，即开卷读书，沉浸于学海，潜心于探究。他大学本科就读于湘潭师范学院，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是著名学者陶敏先生。陶老师学殖深厚，学风谨严，身传言教，为他树立了榜样。当时古典文学界正兴起宏观研讨之风，小杨对此颇感兴趣，陶老师肯定了他对宽阔视野的追求，同时告诫他在做学问上要肯下扎实工夫，这些教导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上海师范大学攻硕的三年期间，我和他多所切磋。除了讲授词学专业知识外，还请校内外的老师为他开设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等课程，他的勤学好问、勇于思考给大家留下较深的印象。其中特别要提到的，便是我们合作编撰《唐宋词书录》一书和他硕士论文《〈草堂诗余〉研究》的写作。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编写过一份《唐宋词书目》，载录自古及今有关唐宋词的书目共千余种，作为

《唐宋词鉴赏辞典》的附录。受体例限制,《书目》所收材料有限,而就我目力所及,尚大有拓展余地。这之后,我便筹划在《书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广罗词籍版本,并补充历代文献中有关词籍流传的记录文字,形成一部较完备的《唐宋词书录》专著。这项工程的工作量较大,需要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搜辑资料。当时我正在给硕士研究生开设《词籍研究》的课程,打算以课题带动教学,于是便和小杨商量,邀他来共同承担。他很乐意接受了这个任务。上海师大图书馆里原藏有大量善本书籍,目录学和历代词集收藏尤富。这一点还得归功于已故老馆长陈子彝先生的远见卓识,20世纪50年代,旧书店少人问津,他当机立断以廉价购进大量古书,为学校筹建了一个丰富的线装书库。我们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因此受益不少。杨万里住宿校内,带着师妹郭素霞等每天钻在古籍阅览室里,在尘封已久的书库上下翻寻,并专心阅读和抄录有关文献。此外,我们还跑了校外许多图书馆,不断地扩充、积累资料,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书稿的编撰。字数亦由《书目》的9万多扩充到初稿的70余万。加上录入、打印后的校订工作,书稿前后花了近两年时间。此稿在当时可谓大陆学界的第一部有关唐宋词研究的书录文献。

编撰《书录》为小杨日后的学习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时,我考虑,既然小杨在编撰《书录》的过程中投放了大量精力,熟悉了许多材料,何不让他驾轻就熟地从已掌握的资源中提取合适的题目呢?经过反复斟酌,我给他选定《草堂诗余》作为其硕士论文的研究题目,一则是因为该书的版本情况较复杂,此前罕有人加以系统清理;二则该书对明清词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从它的成书演变过程和流行状况中,可以考察不同时期词学思想的面貌。这样,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后来,在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词学专家方智范先生为主席的论文答

辨会上,杨万里的《〈草堂诗余〉研究》获得了与会专家的较高评价。那年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招考博士生,录取了杨万里,据说也与这篇论文所显示的学业基础不无关系。后来他在《文学遗产》、《文献》等杂志上刊登并辑入本书的有关《草堂诗余》研究的文章,都出自这篇论文。当然,较之原稿又有所提高。

《负暄集》里收录的其他论文,大多是杨万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之余撰写而成,有的发表前也曾给我看过,皆不乏一得之见。如今他在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深造,相信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古典文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2010年8月4日

序 二

陈尚君

杨万里编历年论文二十篇为一集，问序于我。因为我曾忝任他博士期间的导师，看着他走过十几年的努力与进步，很为他的成绩而感到高兴，一直希望写点文字，也就马上答应下来。

与万里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997年的春天。他因陶敏教授和蒋哲伦教授的推荐，拟报考到我名下读博士学位——前一年我刚取得指导博士的资格。见面先报名，我一听就大高兴：“久仰啊，大诗人杨诚斋来了。”他马上解释，他出身在湖南岳阳农家，父母都不了解古代文史或历代名家，只是抱着期待儿子前程远大、鸿图万里的愿望，给儿子起名，他的弟弟叫千里。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万里充满自信：中学毕业后，考入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追随陶敏教授初悟学术之门径和意义；硕士期间到上海师范大学，导师是蒋哲伦教授，在词学基本文献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接着就出示硕士论文的初稿，题目是《〈草堂诗馀〉研究》。这些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陶敏教授在经历二十多年曲折经历后重返学术岗位，他对唐代文学文献的总体把握和精细考证，在国内唐代文学圈堪称翘楚。1995年我曾与他合作完成《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之补正，深切体会他在资料相对匮乏的湖南，硬是从全唐诗文的缝隙中努力探寻唐代诗人生平和唐诗本事的卓越建树。蒋哲伦先生则前此已经读

过她整理的《尊前集》和《周邦彦集》，很佩服她在唐宋词基本文献方面所作遵循规范而又有独到开拓的工作。万里经过他们的指点，已经具备很好的文史基本根柢，具有进一步深造的潜资。万里告诉我，他的学位论文研究《草堂诗余》，是蒋老师指定的题目，并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从这本书的存世版本调查、收集做起，在比较文本同异的基础上寻觅各本的关系和演进，并进而探讨这本书在宋元明清间广泛流传的内在原因。他还告诉我，他在硕士期间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协助导师完成七十万字的《唐宋词书录》的工作。虽然当时这本书还无法看到，但陈伯海先生所编《唐诗书录》是我案头的必备书，这一网罗唐诗基本典籍于一编的工作，编录者当然极其辛苦，但给予研究者的方便，则功德无量。对于年轻学子，能参与这样的工作，我相信可以为一生的学术道路奠定根基、明确方向。我至今仍然记得万里说到他的经历时的朴实坦率，认真诚恳。

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万里顺利进入复旦，从我读书。对于唐宋词学，我以前只写过几篇词家生平和著作考证的文章。大约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因为全力做全唐诗文的辑录补订，很少再涉足词学研究。万里已经在词学研究方面作了很可贵的努力，放弃很可惜。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坦率地与他交换想法，希望他继续宋词方面的研究，并在原来偏重文献研究的格局中，寻求一些变化，可以考虑选择做与宋词有关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几经反复，才确定《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的选题。因为我对此也不太熟悉，虽然也经常与万里讨论，但所见当然不免隔靴搔痒，万里倒确实如现在研究生培养要求那样，独立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他的论文分为《宋词与都市》、《宋词与节日》、《宋词与歌妓》、《宋词与市民》四大块，对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宋词作了全方位的论述，有很多创新的见解。举个小例子，宋词是歌宴上的文学，许多作品都

由歌妓演唱。他特意辑录唱词歌妓的资料为《红尘声党录》一编，正可见用功之勤。他的论文得到答辩老师的称许，并最终得以修订出版，我也预有荣也。

博士毕业后，万里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编辑，我与他仍有较多的来往。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古籍专业出版社之一，对于出版图书的学术把关一直有很严格的规范，对编辑的学术要求也很严格。万里原来的专业所长派上了用处，他在另一个学术环境里努力地耕耘。就如他自己说的，九年间将博士论文以及与蒋老师合作的《唐宋词书录》整理出版，校点了六种古籍著作，写了四本普及读物，还写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当然，他的本职工作还是做古籍编辑，有关情况他说得不多，我也不尽了解。但就知道的，一是策划并实际操作完成了《唐宋人选唐宋词》一书，题目当然是模仿明末开始成型的《唐人选唐诗》，但求全备则有许多困难，终于完成出版，对学者是很有用的基本典籍。二是就我经手的书而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就有《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朱东润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文集》以及我的《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总约 250 万字，他都很认真地处理文稿，按时出版。三是将上古中断未完的《杨树达文集》出齐（已出者重版）。这当然只是他全部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当编辑当然很辛苦，当然是为别人作嫁衣，但有这段经历，在他的学术道路上也是弥足珍贵的。这几天因为要写序的缘故，又重新翻阅他当年的博士论文，读到他在后记中写到自己入大学前的兴趣和爱好：“然性好结交特立独行之友，喜谈天下大势，呼朋引伴，慷慨有提剑看山之志。”还有一首完成博士论文后的遣兴诗：“遁迹京华枉自嗟，莺莺燕燕逝天涯。十年学就屠龙技，转寻原上斩小蛇。”这当然是近代以来湘人的共同性格和追求，也是万里从农村来到上海，从兴趣读书到专业研究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记录，可惜我当年

对此注意很少。但在工作九年后,成了家,有了孩子,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激情逐渐平和,多幻想的性格也渐趋务实,更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不再如当年的青涩,但真诚的进取精神和认真的学术态度依然保持未变。

编在本书中的论文,除了谈《草堂诗馀》的硕士论文等几篇写于九十年代,多数是最近十年的论文,很可以见到万里这些年学术发展的足迹。这些论文的学术价值可以由读者来判断,我作为曾经的导师,在这些论文中读到的是他的学术领域进一步开拓,研究态度较前更为客观公允,研究见解也更为深入妥贴,这些都是很可喜的。其中一些论文以前曾读到过,多数则是这几天才读到,有几篇我很赞赏。比如《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温州“太学九先生”的学术与文学》,就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文学群体,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也有特殊的意义。《流星般消逝的状元》谈刘焯的生命轨迹,以前我作欧阳修研究的时候关注过这个人,但没有做全面分析,万里的研究给我很多启发。《论苏轼〈书李主词〉之失》重点是辨析苏轼批评李煜“垂泪对宫娥”一词的意见是否妥当,讨论很充分,结论也可靠,更精彩的是由此而引发苏轼的政治识见并不高,又好发高论,“作翻案文章的强烈愿望在驱使着他手中的笔”,经常“真诚地说了一些见识低下的话”。“由于他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见识低下的话产生了较为广泛的负面影响。”就超越了仅仅讨论李后主词的范围。这几篇在本书中都不算长篇,更好的应该是谈《花庵词选》,谈徽宗朝政治与文学,谈词学尊体,谈乐剧词和俗文学交流,我就不一一重复了。

去年夏初,万里来找我,说决意要到南开大学追随孙克强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准备辞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工作,这让我很感意外。最近几年,上海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博士毕业都留不下来,而万里在出版社已经评上副编审,担任了编辑室副主任,工作顺利

而胜任。我很想劝他再作斟酌,但万里告诉我,自己一直有继续从事专业研究的愿望和冲动,而且相信自己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绩,因此而选择重新出发。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也充满自信。这样,我只能祝福他的选择。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表达对万里的期待。万里在从学的十七年间,主要从事唐宋词学研究,在基本文献和专题研究方面都已经有了可观的积累。继续努力,在开拓的宽度和成果的数量上有更多的收获,以他的敏锐和勤奋,都是可以预期实现的。但我觉得,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格局,出现新的气象和变化。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大约黄金时期还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的十多年,在文献积累和视域开拓方面都有至今值得称道的成就,似乎比相邻的唐史研究和敦煌吐鲁番研究更显得突出。但是最近十多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文史圈的研究兴趣和方法都有天翻地覆的改变。相比较来说,文学史研究的变化要小得多。许多学者都在关注今后的发展方向,追求新的突破和变化。我虽然以做文献为主,但始终觉得作品的增加和考订,作家生平的揭示和厘清,只是研究的基础工作,学者应该追求更高远的目标,探索更复杂的真相。就我现在的认识,一是更强烈地感到中国学术只是国际学术的一部分,学者一定要改变长期闭关自守形成的仅以国内出版物为研究积累的狭小格局,打开眼界,更多吸取海外学人的研究成就,学习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二是纯文学的本体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文学毕竟是社会生活的记录,古代文学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我们应该吸取古代文史研究所有特定领域的研究成绩,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范围内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三是文学是人的经历和情感的记录,文学研究仍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家生命历程的研究。许多年以前,朱东润先生从英

国传记文学中看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并为此将后半生的努力全部投入,可惜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延续。小说家当然更愿意向壁虚构,学者也更乐意浅尝辄止,似乎没有人愿意在详尽分析文献后彻底理清文学家的人生轨迹,再来解读他的人际关系和作品真相。但我相信这一现状迟早会有所改变,毕竟原有的积累已多,文学研究早晚总要走进具体的人的世界。就唐宋词学研究来说,基本文献因为有朱祖谋、夏承焘、唐圭璋、任半塘、王仲闻等杰出学者的积累,整体水平比其他领域要高出许多,在作品和作家研究方面尤其突出。但词学研究一直很单纯,自成系统,自有规范,它的成就和局限大约都在此。今后的突破和开拓,我相信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会面临同样的机缘与挑战。不知万里对此是否赞同。

我在到大学以前曾经在农场有八年的务农经历,有幸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更感到机缘之难得,学术性格上与万里有些相似,或者说未免有些狂狷。虽然唐宋以后觉得狂狷有违中道而稍存贬义,但《论语》中“狂者进取,狷者有不为也”一句,《汉语大辞典》解释为“指志向高远的人与拘谨自守的人”,我还比较赞同。随着年岁渐增,人可以不狂,但进取之心则不能轻弃。狷之有不为,我则体会可以是学术上的洁癖,因为抱定高远的目标,可以放弃眼前的利益,不必追逐世俗的乐趣,不要重复已有的研究,也不要满足一知半解的所谓创获。谨此与万里共勉吧。

2010年8月8日于上海武川路寓所

目 录

序一	蒋哲伦
序二	陈尚君

《草堂诗馀》研究	1
《草堂诗馀》三论	68
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	82
略论词学尊体史	93
徽宗朝的政治与文学	104
乐剧词浅探	128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153
重读《卖油翁》	171
苏轼与《归去来兮辞》关系发微	175
流星般消逝的状元	184
论苏轼《书李主词》之失	188
论《花庵词选》	195
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	209
温州“太学九先生”的学术及其文学创作	223
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	241

秋风里的张炎	272
跋《蔡嵩云藏友朋词札》	279
薛绍徽吕碧城异同论	290
又伤利器未逢时	305
追求学术的理论品格	324
后 记	328

《草堂诗余》研究

《草堂诗余》是南宋中期坊间编选的一本词集。它不但是词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唐宋词选本,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词学现象。研究它的成书、版本流传及影响,可以略窥宋元明清词学思想之一斑;大而言之,可以反映出宋元明清文学思潮变化的某些侧面,有利于加深对这些时期文学思想的认识。因此,研究《草堂诗余》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文分为上篇、下篇。上篇重在对《草堂诗余》版本诸问题的研究;下篇探讨《草堂诗余》在宋代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元明清所产生的影响。考证与学理阐述将是本文的基本面貌。

上篇

第一节 《草堂诗余》成书时间及编者

《草堂诗余》的成书时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以为编成于南宋庆元(1195—1200)以前,依据是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作于庆元年间,书中已提到此书。王楙原话是:“《草堂诗

馥》载张仲宗《满江红》‘蝶粉蜂黄都褪却’，注：‘蝶粉蜂黄，唐人宫妆。’仆观李商隐诗有曰：‘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知《诗馥》所注为不妄。唐《花间集》却无此语。或谓蝶交则粉落，蜂交则黄落。”^①按：“蝶粉蜂黄”为周邦彦《满江红》（昼日移明）一词中语^②，全句是：“蝶粉蜂黄都褪了，枕痕一线红生肉。”王楙说此词为张仲宗作，实误。类编本《草堂诗馥》，如元至正泰字书堂本、明遵正书堂本、安肃荆聚本；词话本《草堂诗馥》，如四印斋本，均不载此词，明代顾从敬分调本中始有之，题作周美成词。对周词中“蝶粉蜂黄”一语最早作解释的是胡仔（1110—1170）《苕溪渔隐丛话》，其书云：“‘蝶粉蜂黄都过了’……后见一相识云：‘过’字乃‘褪’字，而蝶粉蜂黄乃当时官中时妆，故宋子京《蝶恋花》云‘泪落胭脂，界破蜂黄浅’。则知方睡起时，宫妆褪尽，所见唯一线枕痕耳。”王楙所见注释本《草堂诗馥》，其注当用此。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续集》卷四“诗事·蝶粉蜂黄”条亦云：“尝有问予，周美成词曰‘蝶粉蜂黄都过了’用何事？予曰：记得李义山集有之。李《酬崔八早梅》曰：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堕额藉蜂黄。又《赠子直花下》曰：屏缘蝶留粉，窗油蜂印黄。周盖用李语也。”程大昌去世时，《野客丛书》尚未成书，王楙“仆观李商隐”等语，或与程大昌语偶合耶？又，罗大经《鹤林玉露》云：“杨东山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词云‘蝶粉蜂黄浑退了’，正用此也。”^③可证早于罗书数十年的王楙“或谓”一句，非泛泛而谈。王楙虽然将周邦彦词误记为张元幹（仲宗）词，但他明确提到

① 《野客丛书》卷二十四，《四库全书》本。

② 今传宋元以来周邦彦词集均有此词，故此词为清真所作确定无疑。

③ 《鹤林玉露》甲编卷四“蝶粉蜂黄”条。该处尚有如下文字：“而说者以为宫妆，且以‘退’为‘褪’，误矣。余因叹曰：区区小词，读书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文章而可臆见妄解乎？”作者罗大经，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鹤林玉露》甲编成书于淳祐戊申（1248）。

《草堂诗余》，确可为《草堂》^①在庆元以前产生的重要证据。

今人言及《草堂》，必称“宋武林逸史编”或“宋何士信编”，值得认真考虑^②。陈振孙距《草堂》成书年代较近，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草堂》与《类分乐章》、《万曲类编》等排列在一起，统之曰：“皆坊间編集者。”按陈氏惯例，作品集有作者名或编者名的话，一定会记载清楚。今传《草堂》最早的两个版本是元至正癸未庐陵泰字书堂本（1343）和至正辛卯双壁陈氏本（1352）。癸未本没署名，辛卯本则有“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标记，为其他各本所无。今传宋人选唐宋词，如《复雅歌词》、《绝妙好词》、《花庵词选》等，均有编者姓名；宋人记载《草堂》时均无编者之名，连广见博闻的陈振孙也不例外。联系《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本身的诸特点（详下），我们倾向于认为：何士信不是原编者，而是《草堂》的“增修笺注”者之一，为宋末元初人（有径称其为元人者）。至于“武林逸史”之名，则是顾从敬的别名（详下）。

“草堂”二字命名，究竟有何寓意？在文学史上，草堂与文学确有深远的联系。“草堂”一词，至少在南朝文学中就出现了。孔稚珪《北山移文》中云：“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用草堂名居所，以标主人风操之高雅。李白在青城山筑草堂读书，他的诗集即名《草堂集》。杜甫在成都有两个草堂：一在浣花溪，一在万里桥。浣花草堂众所皆知，后者则有杜甫《狂夫》诗自记之：“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草堂诗余》得名是否与上述典故有关？明代杨慎的答案是肯定的：“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

① 本文中，谈《草堂诗余》的版本差别时，则署全称，一般论述时简称《草堂》。

② 笔者后有《关于〈草堂诗余〉的编者》一文，发表于《文献》1999年第3期。今将其要点补入此处。2009年12月补记。